

小银行发挥优势了吗：村镇银行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杨 晨 朱 佳 马九杰

内容提要：基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长期学术争论，本文从设立村镇银行这一“准自然实验”出发，评估了小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传导机制和内在根源。在理论方面，构建城乡两部门资本配置模型，将设立村镇银行这一事件纳入金融配置体系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研究假说；在实证方面，考虑到村镇银行的发展历史脉络，整理出2010—2017年909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性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设立村镇银行并不能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为相关领域的长期讨论提供了一个扎实的中国证据；(2)机制分析发现，涉农产业基础薄弱和县域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是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进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3)村镇银行“使命漂移”现象导致有限的金融资源从涉农产业部门流出，进而使农村居民收入呈现下滑趋势。据此形成的政策启示是，应对村镇法人银行进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并引导其回归支农支小的最初定位，重点加强对村镇银行资产业务监管，在农业大县或金融欠发达区域进一步充分发挥村镇银行基层网点的作用。

关键词：村镇银行 城乡收入差距 使命漂移 准自然实验

作者简介：杨 晨，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250014；

朱 佳，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博士后，100021；

马九杰（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100872。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12-0072-17

一、引言

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学界持续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也一直被全球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长期关注。在Shaw(1969)和McKinnon(1973)等金融深化论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观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研究”(20&ZD1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空间配给缓解和实体经济金融普惠中的作用研究”(71973146)。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马九杰电子邮箱：majiuje@126.com。

点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Levine和Zervos, 1998;武志, 2010),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尝试通过发展金融业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然而,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在学界仍未达成共识。一方面,相关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有助于金融资源流向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带来包容性发展机会,进而缓解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Banerjee和Newman, 1993; Beck等, 2010)。另一方面,也有较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强化资源分配不均,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获取金融服务并用以促进收入增长,助推“强者恒强”,进而会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Clarke等, 200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金融体制改革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而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正是金融作为“国之重器”应当支持的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城乡收入差距是最直接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持续关注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针对这一发展命题的研究和解释仍处于持续争议的探索阶段。部分文献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激发和提高了城市部门的经济活力和收入水平,但对农村部门存在门槛效应,因此难以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叶志强等, 2011;刘玉光等, 2013)。王征和鲁钊阳(2011)等发现,农村金融发展甚至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当然,也有较多文献的证据支持金融市场的持续演进尤其是普惠金融市场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进而能够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胡宗义、李鹏, 2013;李建伟, 2017)。

已有文献基于国内外两个视野针对金融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丰富探讨,但仍存在三个研究间隙:一是针对金融体系中村镇银行的实践影响关注不足;二是尚待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县域金融市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关系;三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准政策实验和因果论推断小微正规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以村镇银行设立作为切入点,针对上述亟待探索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2006年末,银监会印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县域(县以及县以下地区,如乡、镇)设立村镇银行等机构,激活欠发达地区的县域金融市场。设立村镇银行这一事件在县域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鲑鱼效应”(马九杰等, 2021),提高了县域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王雪、何广文, 2019),激发了小微正规金融市场的信贷活力。值得指出的是,既有文献发现放松大银行监管有助于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这反映出金融深化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Beck等, 2010)。而村镇银行这一类服务于小微信贷主体的小银行能否帮助缩小收入差距,是对金融深化理论及其收入不平等假说的重要理论拓展。

本文以设立村镇银行这一事件为准政策实验的立足点,通过整理各县(市、区)村镇银行成立时间数据,结合2010—2017年909个县的社会经济数据,运用DID和PSM-DID方法,实证测度村镇银行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丰富政策启示,本文对其作用机制和影响情境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设立村镇银行在实践中落入了“使命漂移”陷阱,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命漂移”的主要原因在于涉农产业基础薄弱和县域银行业同质化竞争,导致更多金融资源流出涉农部门,限制了金融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增收的效果。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包括如下三点。一是在县域层级首次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解析了村镇银行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进而得出更为严谨的因果推断,为学术界和金融实务界提供了一项科学的、可信的中国证据。二是立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金融的经营实践构建了

两部门资本配置模型,推导和演绎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和潜在的干预方向,得出其在“使命漂移”和“使命不移”背景下的不同赋能效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理论框架。三是探讨了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现象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决策者进一步把握农村普惠金融体系该如何坚定“使命不移”促进资本下沉,以及如何通过调整既有银行体系架构来推动城乡金融服务协调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二、理论分析

(一)两部门资本配置模型

本文基于中国县域金融服务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考察村镇银行设立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关系。2006年,银监会采用“增量式”的改革路径,印发《意见》等一系列通知,要求本着“先中西部、后内地”的原则,鼓励不同银行机构在县域设立村镇银行。在此基础上,2010年印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通过强化执行力、采取“挂钩”政策等方式,使设立村镇银行进入爆发期,2010—2016年新设的村镇银行每年均超过100家,其中2011年新设377家。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650家,覆盖了70%以上的县。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相同点是村镇银行法人机构往往设立在县城,不仅能够扩大县域金融市场的整体服务规模,还能够提升县域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沈杰、马九杰,2010)。

基于此,本文在孙永强(2012)、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等提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设立村镇银行这一事件切入,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两部门模型,更好地从理论上解释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假设城镇和农村的总产出 Y_u 和 Y_r 均采用固定替代弹性的CES生产函数表示:

$$Y_u = A_u \left(\sum_{i=1}^n \alpha_i x_i^\rho \right)^{\frac{1}{\sigma}}, A_u > 0, \rho = \frac{1}{1 - \sigma} \quad (1)$$

$$Y_r = A_r \left(\sum_{i=1}^n \beta_i y_i^\lambda \right)^{\frac{1}{\varepsilon}}, A_r > 0, \lambda = \frac{1}{1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u 代表城镇部门, r 代表农村部门。 α_i 和 σ 分别为城镇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 β_i 和 ε 分别为农村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 A_u 和 A_r 为模型的外生变量,分别表示两部门的生产技术。假设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采用各自的劳动力和银行资金进行生产,则生产总值分别为:

$$P_u Y_u = P_u A_u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K_u^\rho \right)^{\frac{1}{\sigma}}, A_u > 0, \rho = \frac{1}{1 - \sigma} \quad (3)$$

$$P_r Y_r = P_r A_r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K_r^\lambda \right)^{\frac{1}{\varepsilon}}, A_r > 0, \lambda = \frac{1}{1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P_u 、 L 、 K_u 、 P_r 、 N 、 K_r 分别表示城镇工业品价格、城镇劳动力投入、银行资金在城镇部门的投入、农村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投入、银行资金在农村的投入。^①假设银行总资金为 K , $K = K_u + K_r$ 。当村镇银行介入后,总资金可表示为: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理论分析部分的 K 具体是指银行资金,区别于传统生产函数中的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将物质资本视作常量,并不影响模型推导结论,为便于简化分析,本文在理论分析中不做单独考虑。

$$K = sK + (1 - s)K \quad (5)$$

其中, s 表示银行总资金中村镇银行所占比重, $1 - s$ 表示县域内其他银行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在村镇银行的资金 sK 中, 有 θ 比重用于农村部门, $(1 - \theta)$ 比重用于城镇部门; 在县域内其他银行的资金 $(1 - s)K$ 中, 有 t 比重用于农村部门, $1 - t$ 比重用于城镇部门。此时:

$$K_u = (1 - \theta)sK + (1 - t)(1 - s)K = [1 - (\theta - t)s - t]K \quad (6)$$

$$K_r = \theta sK + t(1 - s)K = [(\theta - t)s + t]K \quad (7)$$

基于此, 将式(6)和式(7)分别代入式(3)和式(4)中, 可得:

$$P_u Y_u = P_u A_u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 [1 - (\theta - t)s - t]K \}^\rho \right)^{\frac{1}{\rho}}, A_u > 0, \rho = \frac{1}{1 - \sigma} \quad (8)$$

$$P_r Y_r = P_r A_r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1}{\lambda}}, A_r > 0, \lambda = \frac{1}{1 - \varepsilon} \quad (9)$$

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 劳动和资金市场出清, 城乡居民的劳动收入分别为:

$$I_u = \frac{\partial P_u Y_u}{\partial L} = P_u A_u \frac{1}{\rho}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 [1 - (\theta - t)s - t]K \}^\rho \right)^{\frac{1}{\rho} - 1} \cdot \rho \alpha_1 L^{\rho - 1} \quad (10)$$

$$I_r = \frac{\partial P_r Y_r}{\partial N} = P_r A_r \frac{1}{\lambda}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1}{\lambda} - 1} \cdot \lambda \beta_1 N^{\lambda - 1} \quad (11)$$

在此基础上, 为便于简化分析, 令 $P_u A_u \alpha_1 L^{\rho - 1} = E$, $P_r A_r \beta_1 N^{\lambda - 1} = F$, 可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Gap = \frac{I_u}{I_r} = \frac{E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 [1 - (\theta - t)s - t]K \}^\rho \right)^{\frac{1}{\rho} - 1}}{F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1}{\lambda} - 1}} \quad (12)$$

进一步地, 对村镇银行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 s 求一阶偏导可得:

$$\begin{aligned} (t - \theta) \frac{E}{F} \left[\left(\frac{1}{\rho} - 1 \right)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 [1 - (\theta - t)s - t]K \}^\rho \right)^{\frac{1}{\rho} - 2} \times \alpha_2 \rho \{ [1 - (\theta - t)s - t]K \}^{\rho - 1} \times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1}{\lambda} - 1} + \right. \\ \left. \left(\frac{1}{\lambda} - 1 \right) \left(\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1}{\lambda} - 2} \times \beta_2 \lambda \{ [(\theta - t)s + t]K \}^{\lambda - 1} \times \left(\alpha_1 L^\rho + \alpha_2 \{ [1 - (\theta - t)s - t]K \}^\rho \right)^{\frac{1}{\rho} - 1} \right] \\ \frac{\partial Gap}{\partial s} = \frac{\quad}{\left\{ \beta_1 N^\lambda + \beta_2 \{ [(\theta - t)s + t]K \}^\lambda \right\}^{\frac{2(1 - \lambda)}{\lambda}}} \quad (13) \end{aligned}$$

由此可知, 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 即 $\partial Gap / \partial s$ 的正负值, 将取决于 t 和 θ 的相对大小, 即存在如下条件函数:

$$\begin{cases} \frac{\partial Gap}{\partial s} > 0, \text{ s.t. } \theta < t \\ \frac{\partial Gap}{\partial s} < 0, \text{ s.t. } \theta > t \end{cases} \quad (14)$$

当 $\theta > t$ 时, $\partial Gap / \partial s < 0$ 。当村镇银行投入农村部门的资金比例高于县域内其他银行时, 意味着村镇银行并未发生“使命漂移”, 能够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当 $\theta < \iota$ 时, $\partial \text{Gap} / \partial s > 0$ 。当村镇银行投入农村部门的资金比例小于县域内其他银行时,意味着村镇银行发生了“使命漂移”,不能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产生反向影响。

(二)研究假说与影响机制

1. 针对核心观点的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文立足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结合已有文献证据支持,提出研究假说。已有研究认为,在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中小金融机构容易发生“使命漂移”(Morduch, 1999; Hermes 等, 2011),即当金融机构更加注重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时,它们会向更高收入群体和大规模企业倾斜更多的资源,进而偏离促进普惠、服务小微客户的使命,即发生“使命漂移”。对于村镇银行而言,为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乡村振兴是它们的重要使命。但现阶段,村镇银行难以兼顾服务“三农”和营利双重目标(陆智强, 2015),多数村镇银行会更加关注自身的经营利润。因此,村镇银行能够真正服务于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业务十分有限,部分村镇银行甚至会将有限的资金从“三农”领域转向非农部门(周立, 2020)。同时,根据银行业竞争对小微信贷可得性影响的“信息假说”,在县域内设立村镇银行必然会提升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进而减少关系型借贷(Petersen 和 Rajan, 1995)。这意味着银行不愿意出于“培育客户”的心态而将信贷服务投向高风险的涉农部门,这也会加剧“使命漂移”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说 H1。

H1: 由于存在“使命漂移”现象,设立村镇银行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与之对应的备择假说是,若“使命漂移”现象不存在,设立村镇银行会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换言之,若村镇银行严格贯彻支农支小政策,相较于县域其他金融机构,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农民、农业、农村发展,则能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 关于影响机制的深入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新设立的村镇银行可能会基于“使命漂移”现状,加剧金融市场资金错配,导致更多的资金从“三农”领域流向非农领域,进而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上文基础上,本文尝试分析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机制,挖掘“使命漂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村镇银行在农村部门 θ 和城镇部门 $1 - \theta$ 之间的资金配置方案,基本上反映了其“使命漂移”的程度,而这可能与当地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结合黄益平等(2018)、马九杰等(2021)的研究,本文把影响村镇银行“使命漂移”程度的宏观因素分为两类:一是县域涉农、非农产业的发展状况,二是县域银行业的市场结构。

一方面,县域农业产业基础的差异会影响新设立的村镇银行在农村部门 θ 和城镇部门 $1 - \theta$ 之间的选择。银行天然存在逐利性,农业产业自身有发展潜力才能够吸引银行支持。若一个县域农业资源较为匮乏、农业产值占比较低,往往其农业产业的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农村部门对于资金的需求也较为有限(檀学文等, 2016)。在此情境下,村镇银行更倾向于将金融资源投入城镇部门。这也意味着 θ 会显著降低,使 $\theta < \iota$, 此时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难以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反,在农业产业基础好的县中,村镇银行支持“三农”领域的倾向更明显,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更小。从整体来看,中国涉农产业大而不强,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金文成、靳少泽, 2023)。基于此,涉农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是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也是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H2:县域涉农产业基础薄弱,导致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县域银行业发展状况的差异会影响新设立的村镇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意愿。网点设立是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最直接的方法(董晓林、徐虹,2012),设立的村镇银行能否在农村基层建设网点,是其是否能够向涉农部门提供金融支持的关键(马九杰等,2021)。当一个县域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时,新成立的村镇银行更容易在基层设立网点以填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缺。然而,当一个县域银行发展存在同业竞争时,村镇银行很难通过在基层开设网点来与已有的银行网点竞争,因此也难以直接向“三农”领域提供服务。这也意味着 θ 会显著降低,使 $\theta < t$,最终导致 $\partial Gap/\partial s > 0$,即村镇银行更容易发生“使命漂移”,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相反地,在银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县域,村镇银行更愿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更小。基本上中国每个县域存在至少一家农信法人机构,农信体系凭借地缘优势和亲缘优势(崔恒瑜等,2021),能够以低成本在乡镇一级开设网点。新成立的村镇银行始终存在竞争壁垒,这种竞争在银行业发达的县域尤为明显。因此本文认为,县域银行业或多或少存在竞争,是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的另一个关键原因,这也是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县域银行业存在竞争,导致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与变量选取

实证分析的重点在于评估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考虑到各县域设立村镇银行是一个逐步推广的过程,本文参考Beck等(2010)和马九杰等(2021)的思路,运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构建以下模型:

$$Gap_{it} = \beta \times villagebank_{it} + \varphi \times \sum X_{it} + \lambda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5)$$

式(15)为双重差分模型。其中, i 代表县, t 代表年份, X_{it} 是控制变量, λ_i 是县域固定效应, $year_t$ 是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是误差项。

1.被解释变量

Gap_{it}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 i 县 t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参考陆铭和陈钊(2004)、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的经典做法,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villagebank_{it}$ 为 i 县 t 年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的虚拟变量,若设立则 $villagebank_{it}$ 等于1,否则为0。银监会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设立村镇银行,2010年进一步印发相关通知,使村镇银行进入爆发增长时期。作为正规金融组织,村镇银行的设立主要受到外生政策的影响(胡金焱、张乐,2004;张博、孙涛,2023),因此参考马九杰等(2021),将其作为外生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少数县域可能会有多家村镇银行,此时,本文以该县域第一家村镇银行设立的时间作为衡量 i 县 t 年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的标准。

3.控制变量

参考吕勇斌等(2020)、马九杰等(2021),本文控制了县级经济社会指标,包括人均GDP、行政

区域面积、总人口、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财政自给率、银行业竞争环境、农信机构市场化改制等变量。此外,本文加入县域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县域特征;加入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其他政策变化、经济周期等因素对结果的干扰。特别地,为了更好地解决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采用县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思路

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和DID方法相结合可以有效矫正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通过PSM-DID方法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首先,通过Probit模型估计出倾向得分,采用卡尺最近邻法将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其次,剔除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得到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最后,对得到的样本再次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得到矫正选择性偏误后的回归结果。

(三)事件研究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的因果分析结果具有统计意义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村镇银行设立之前满足平行趋势。本文沿袭Li等(2016)的做法,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并分析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效果。据此,本文构造模型(16):

$$y_{it} = \sum_{k \geq -6}^7 \beta_k D_{it}^k + \varphi \times \sum X_{it} + \lambda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6)$$

式(16)与式(15)设定的不同之处在于,将核心解释变量 $villagebank_{it}$ 替换为 14 个虚拟变量 D_{it}^k 的加总。其中, D_{it}^0 为处理组是否处在设立村镇银行的当期,是为 1, 否则为 0。 $D_{it}^1 \sim D_{it}^7$ 这 7 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处理组是否处在设立村镇银行之后的第 1~7 期,是则为 1, 否则为 0。 $D_{it}^{-6} \sim D_{it}^{-1}$ 这 6 个变量分别为处理组是否处在设立村镇银行之前的第 6~1 期。本文将处理组设立村镇银行之前的第 7 期作为基准,以衡量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不同时期的差距。

(四)数据来源、选取原因和描述性分析

实证分析的平衡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8 年(2010—2017 年),包含 7272 个观测值。数据来源有两个。第一,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信息。包括全国所有县(市、区)银行网点的批准成立时间,包括国有五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信机构、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2010—2017 年是村镇银行机构迅速发展的时期,能给实证分析提供充足的丰富度。第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各县的政府工作报告。包括 909 个县(市、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等经济社会指标。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本文尽可能地搜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县(市、区)的数据,遗憾的是由于本文数据来源较为丰富、年份跨度较大,不同县(市、区)各个变量的缺失情况差异较大,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数据匹配和清理,最终保留了 909 个县(市、区)8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包含 24 个省份,不包括四个直辖市以及海南、西藏、青海,基本能够代表全国整体水平。此外,为避免极端值的干扰,使用缩尾法(Winsorize)对所有连续变量 1 分位点以下和 99 分位点以上的样本进行处理。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	2.6149	0.7830	1.3398	5.1573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是=1, 否=0	0.4249	0.4944	0	1

续表 1

变量	变量含义(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元),取对数	10.1145	0.7087	8.6228	12.0725
行政区域面积	地区的行政区域面积(平方千米),取对数	7.7274	0.8144	5.9865	10.4244
总人口	年末总人口数(万人),取对数	3.6063	0.7839	1.3863	5.1240
第一产业占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0.2026	0.1046	0.0075	0.7478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0.4432	0.1492	0.0396	0.9130
财政自给率	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	0.3394	0.2539	0.0133	5.1491
银行业竞争环境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即县内各家银行网点占比的平方和,HHI指数越小代表市场竞争越激烈	0.3649	0.1062	0.0968	1
农信机构市场化改制	当地农信机构是否进行股份制改革,是=1,否=0	0.5945	0.4910	0	1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DID估计结果如表2的第(1)(2)列所示。第(1)列为仅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加入了全部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²提高了,表明加入控制变量有助于模型更好地拟合。从第(1)(2)列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具体而言,在样本期间,设立村镇银行会推动城乡收入之比提高近0.06,按照表1城乡收入差距的样本均值2.6149计算,样本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提高了2.12%。这一结果初步证明了设立村镇银行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该结论与叶志强等(2011)等一致,也能从侧面表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表 2 基准回归: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

	DID 回归		PSM-DID 回归	
	(1)	(2)	(3)	(4)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0.0586*** (0.0166)	0.0556*** (0.0165)	0.0513*** (0.0164)	0.0526*** (0.016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272	7272	6995	6995
Adjusted R ²	0.3037	0.3145	0.2938	0.303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下同。

为了能够矫正DID方法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得出更具稳健性的结论,本文采用PSM-DID方法估计。具体地,将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将未匹配上的样本删除,用剩余样

本进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第(3)、(4)列中。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稍有减小,但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换言之,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是稳健的。倾向得分匹配剔除了277个观测值,仅占总样本的3.81%,剩余的6995个观测值占总样本的96.19%,据此可认为第(1)、(2)列DID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以上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1,表明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基准回归中,第一年设立村镇银行的96个县虽然是实验组,但为确保实证分析的数据丰富度和样本异质性,本文参考马九杰等(2021)数据处理方法,选择将这96个县的样本保留。同时,本文采取的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统计分析方式,也能够较大程度上规避这一操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二)内生性处理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处理效应异质性

为了确保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是具有统计意义的,需要对DID回归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首先采用事件研究法,剔除第-7期后,基于模型(16)分析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动态影响效果,估计出每一个 D_{it}^k 的系数及90%的置信区间,结果被整理在图1(A)中。在图1(A)中,横轴表示村镇银行设立前后的期数,纵轴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趋势线上的圆点为 D_{it}^k 的估计系数,阴影表示90%置信区间。一方面,从平行趋势检验的角度分析。 $\beta_{-6} \sim \beta_{-1}$ 的值距横轴较近,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没有拒绝零假设,即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也就是说,本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设置合理,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统计意义。另一方面,从长期动态效果的角度来分析,虽然 $\beta_1 \sim \beta_4$ 不显著,但 $\beta_5 \sim \beta_7$ 基本拒绝零假设,且系数值一直处于递增的趋势,表明设立村镇银行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逐年递增。

此外,本文对处理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由于设立村镇银行时点不同,因此处理效应也存在异质性,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产生潜在偏误。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参考罗宏等(2024),使用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方法,将对照组设置为从未接受处理组(Never-Treated Group)。^①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B)所示,处理前趋势基本符合平行趋势检验,显示了以上结论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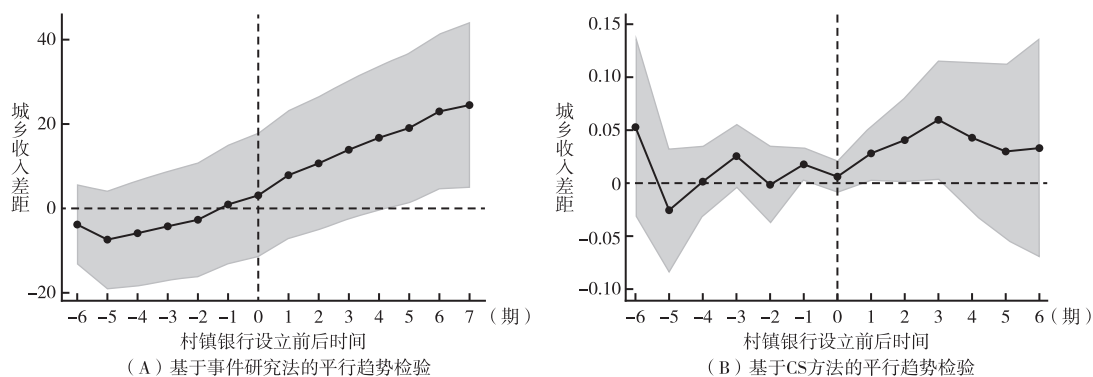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注:按照Callaway和Sant'Anna(2021)方法的原理,在进行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时,2010年已设立村镇银行的96个县域自动被剔除,因此回归结果仅有第0~6期。

^① 本文也尝试将对照组设置为尚未处理的组(Not-Yet-Treated Group),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2. 预期效应检验^①

倘若双重差分模型存在预期效应,则表明设立村镇银行带来的影响并不可信。因此为检验预期效应是否存在,本文沿袭周茂等(2018)的做法,构造核心解释变量的提前1、2期。这一检验也有助于判断可能存在的事前趋势是否会给设立村镇银行带来的效果产生影响。根据预期检验的回归结果,加入变量“提前1期设立村镇银行”,与同时加入变量“提前1期设立村镇银行”和“提前2期设立村镇银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提前1、2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本文DID模型以及PSM-DID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受预期效应干扰。

3. 安慰剂检验

以上结果虽然充分地验证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但上文的统计显著可能来自某些随机因素,因此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参考Li等(2016)和Cantoni等(2017)的做法,按照真实数据生成过程来随机生成虚拟的村镇银行设立事件,基于蒙特卡洛模拟重复了1000次。具体而言,在样本中,2010—2017年依次有96、128、63、85、67、68、50、51个县设立了村镇银行,因此,需要在样本中随机选取96个县在2010年设立村镇银行,在剩余样本中随机选取128个县在2011年设立村镇银行,再在剩余样本中随机选取63个县在2012年设立村镇银行……最终,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所得的t统计量呈现正态分布趋势,反映出蒙特卡洛模拟的随机性;并且其中大多数的t统计量小于使用真实数据所得到的t值(3.37)。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结果没有受到某些随机因素的干扰。

(三)关于实证结果稳健性的讨论^②

1. 排除相关政策因素对实证分析的干扰

一方面,自2006年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以来,初步探索出金融资源供给“东补西”的政策,并在挂钩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调整。^③这一挂钩政策的现实表现为,大型商业银行在东部地区开设一个分支机构,需要相应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一个村镇银行。该政策可能会影响本文设立村镇银行的随机性,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东部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干扰。由回归结果可知,加入固定效应交互项后,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缓解“东补西”挂钩政策的干扰后,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仍然显著。本文还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同时加入中部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西部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另一方面,不同省份存在产业发展、金融基础的差异。产业发展存在资金缺口、正规金融基础较为薄弱的省份,往往会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如探索微型金融机构试点、银行信贷支农支小创新、扩展农业担保业务等。这可能也会给本文因果识别带来一定的内生性影响。为消除这一干扰,本文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各省份固定效应分别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据此,本文的核心观点仍然具有稳健性。

2. 排除其他县域金融机构因素对实证分析的干扰

尽管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充分考虑了当地农信机构发展状况和县域银行业竞争环境,在加入控制变量时,选择了当地农信机构是否进行市场化转制的虚拟变量和反映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的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预期检验效应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留存备案。

② 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实证回归结果,留存备案。

③ 参见《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1〕81号)。

HHI指数。然而,上述两个控制变量不能全方位、清晰地刻画出当地农信机构和大型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这可能也会对本文的实证结论产生干扰。为此,本文通过增加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本文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农信机构网点比重这一控制变量。农信机构往往是县域金融服务供给的主力军,其发展程度、市场势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村镇银行发挥作用。农信机构网点占县域全部银行网点的比重,能够直观地反映当地农信机构的市场势力。因此,在基准回归中控制农信机构网点比重,有助于进一步排除农信势力对实证分析的干扰。回归结果显示,加入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

第二,本文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大型商业银行网点比重这一控制变量。大型商业银行倾向于在县域内的城区开展业务活动,因此村镇银行“使命漂移”的程度可能会受到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占县域全部银行网点的比重,能够直观地反映当地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因此,在基准回归中控制大型商业银行网点比重,以期排除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贷资金配置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回归结果显示,加入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

此外,出于稳健性检验的考量,本文还尝试在基准回归中,同时加入农信机构网点比重和大型商业银行网点比重两个控制变量。以上两个变量再加上基准回归中的银行业竞争环境、农信机构市场化改制两个控制变量,这四个控制变量能全面地、客观地、直接地综合刻画当地银行市场的情况,回归结果仍然较为稳健。

五、机制分析与检验

上文检验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并进行了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村镇银行“使命漂移”进行机制分析与检验。一是,分析涉农产业基础薄弱是不是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二是,分析县域银行业存在竞争是不是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以上检验均通过交互项分析的方式进行。此外,本文还尝试追本溯源,直接检验设立村镇银行对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

(一)关于涉农产业基础薄弱的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中认为,村镇银行“使命漂移”导致更多的资金从“三农”领域流向非农领域,进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由于中国涉农产业基础缺乏比较优势,因此村镇银行可能会更多地信贷资金投入非农部门,产生“使命漂移”行为。考虑到农业产业占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其非农部门的产业优势更为明显,而其涉农产业部门的信贷需求规模较为有限、投资回报率也较低(陈秧分等,2009)。因此,本研究认为,对农业产业占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村镇银行更容易发生“使命漂移”,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的方式进行检验。

本文选取了两个交互项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分别是“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第一产业占比”和“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分别汇报在表3的第(1)列和第(2)列中。从表3的第(1)列中可以看出,交互项“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第一产业占比”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对于那些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县而言,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小;对于那些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的县而言,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

用更大。从表3的第(2)列可以看出,交互项“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对于那些经济较落后的农业大县而言,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小;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大县而言,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大。这初步表明,对涉农产业基础较好的县域而言,村镇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支农支小的政策目标,进而使其推动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小。然而,对于涉农产业基础较薄弱的县域,村镇银行更容易发生“使命漂移”,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PSM-DID的思路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汇报在表3的第(3)、(4)列中,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3的第(1)、(2)列基本一致,有效地支撑了假说H2。

表 3	基于涉农产业基础薄弱的机制分析			
	DID 回归		PSM-DID 回归	
	(1)	(2)	(3)	(4)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0.1305*** (0.0309)	-1.8653*** (0.2118)	0.1297*** (0.0307)	-1.8198*** (0.2132)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第一产业占比	-0.3872*** (0.1436)		-0.3966*** (0.1451)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经济发展水平		0.1891*** (0.0208)		0.1844*** (0.02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272	7272	6995	6995
Adjusted R ²	0.3162	0.3333	0.3057	0.3230

(二)关于县域银行业存在竞争的机制分析

一个地区的银行业存在较大的同业竞争,往往意味着金融基础设施较完善,在此情境下,新设立的村镇银行网点难以深入农村地区,为“三农”领域提供服务,因而只能将更多资金和服务投入非农部门。在中国,基本上每个县域存在至少一家农信法人机构的网点,此时新设立的村镇银行或多或少面临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壁垒,这导致村镇银行始终存在“使命漂移”的倾向,进而推动金融资金更多地投入非农部门,最终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为验证这一设想,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银行同业竞争的交互项,其中银行同业竞争用HHI表示,这与控制变量一致。为了进一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参考Chong等(2013)、王雪和何广文(2019)的思路,本文构建了指数CR3^①。HHI和CR3是0~1上的连续变量,该指标越大表示县域银行同业竞争程度越低。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分别加入了变量“是否设立村镇银行×HHI”和“是否设立村镇银行×CR3”,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与银行业竞争环境交互项的分析结果,汇报在表4的第(1)(2)列中。可以看出,两个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银行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地区(即HHI和CR3较高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小;在银行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即HHI和CR3较低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大。以上实证结果表明,若某县域银行业发展落后,那么新设立的村镇银行进入农村金

① CR3指县域内网点数量最多的3家银行机构的网点数占总网点数的比重。

融市场的壁垒更小,此时村镇银行愿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农业农村部门。相反地,在银行业发展较好的县域,村镇银行更容易发生“使命漂移”。同样地,为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PSM-DID的思路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汇报在表4的第(3)、(4)列中,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4的第(1)、(2)列基本一致,有效地支撑了假说H3。

表 4 基于银行业存在竞争的机制分析

	DID 回归		PSM-DID 回归	
	(1)	(2)	(3)	(4)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0.3330*** (0.0561)	0.8246*** (0.1444)	0.3072*** (0.0567)	0.7685*** (0.1460)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HHI	-0.8225*** (0.1590)		-0.7553*** (0.1623)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CR3		-0.9107*** (0.1684)		-0.8478*** (0.17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272	7272	6995	6995
Adjusted R ²	0.3203	0.3213	0.3090	0.3101

(三)延伸讨论:设立村镇银行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

在机制分析基础上,本部分尝试直接检验“使命漂移”的程度,探讨设立村镇银行分别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在上文的理论分析中可知,之所以设立村镇银行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使命漂移”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抽水机”作用,即村镇银行的设立会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从涉农部门流向非农部门,这一过程会降低涉农产业的资金可得性,进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同时也可能会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据此,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别检验设立村镇银行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农村居民收入用农村居民纯收入表示,城镇居民收入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表示,两个被解释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以上回归结果汇报在表5的第(1)、(2)列中。

表 5 设立村镇银行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评估

	DID 回归				PSM-DID 回归	
	(1)	(2)	(3)	(4)	(5)	(6)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0.0150** (0.0059)	0.0009 (0.0046)	0.0252 (0.0209)	-0.0091 (0.0058)	-0.0153*** (0.0059)	-0.0004 (0.0044)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法人数量			-0.0400** (0.0200)			
是否设立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网点数量				-0.0076*** (0.00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5

	DID 回归				PSM-DID 回归	
	(1)	(2)	(3)	(4)	(5)	(6)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272	7272	7272	7272	6995	6995
Adjusted R ²	0.9316	0.9423	0.9316	0.9320	0.9328	0.9445

从表 5 的第(1)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设立村镇银行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统计意义上的负向影响。在样本期间,平均而言,设立村镇银行会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减少 1.50%。从表 5 的第(2)列可以看出,设立村镇银行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设立村镇银行将县域内有限的资金从农村部门转移出来,但并未能将资金投入城镇实体经济部门,而是购买了其他银行的金融资产(如商业票据等)或通过同业拆出到其他银行,这与本研究团队实地走访、座谈的调研结论一致。

为了进一步得到稳健性的结论,一方面,本文考察核心解释变量的强度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即检验县域内村镇银行覆盖面越广是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大。为此,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设立村镇银行”分别与县域村镇银行法人数量和县域村镇银行网点数量进行交互,加入回归模型,结果分别汇报在表 5 的第(3)(4)列中。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不再显著,而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且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村镇银行规模越大、覆盖面越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负向影响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镇银行“抽水机”观点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本文采取 PSM-DID 的方式进行再次检验,结果分别汇报在表 5 的第(5)、(6)列中。从表 5 的第(5)列中可见,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均高于第(1)列的结果,这进一步验证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负向影响。与之相对,从表 5 的第(6)列中可见,设立村镇银行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同样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这与表 5 的第(2)列结果类似,再次验证了设立村镇银行对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有限,即“抽水机”并没有将金融服务的“源头活水”浇灌到城镇实体经济部门。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设立村镇银行在实践中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样本期内成立村镇银行会推动县域城乡收入之比平均提高 2.12%。第二,村镇银行普遍存在将有限的金融资金由“三农”领域流向非农领域的“使命漂移”现象,这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和小微金融服务的流向错配,进而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第三,涉农产业基础设施薄弱和县域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是产生“使命漂移”现象的原因,也是设立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机制。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探索对村镇银行实施总量控制和末位淘汰的管理制度,以削弱村镇银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强化村镇银行发起行的责任意识,严格控制村镇银行牌照的发放,防止村镇银行法人数量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在有效的风险管控前

前提下,尝试通过解散、合并等方式,引导部分“使命漂移”严重、经营绩效差的村镇银行退出市场。

第二,引导村镇银行回归服务“三农”的定位,鼓励县域中小银行助力涉农实体产业发展,以推动农民收入持续提升。通过调整村镇银行考评体系,减少对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约束,适度提升涉农业务的容错率等,逐渐减少村镇银行“使命漂移”现象。同时,承接好数字普惠金融技术,鼓励村镇银行更多地向涉农部门提供信贷服务,发挥银行业下沉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助推作用。

第三,强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村镇银行资产业务的指导,使其涉农业务比重超过县域银行业平均水平,并鼓励中小法人银行强化自身风险管理能力。首先,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尝试对扎根基层的中小法人银行资产业务结构进行弹性指导,加强对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的监督。其次,鼓励村镇银行的发起行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网点办理涉农业务,提高中小法人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最后,鼓励村镇银行等中小法人银行,借助外部担保体系、涉农保险等风险化解手段,提高支农收益的稳健性、支农服务的可持续性。

第四,在涉农产业基础扎实或银行业欠发达的县域,应适度鼓励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基层网点,进而真正发挥支农支小作用。一方面,在农业大县中,应充分发挥中小银行地缘优势,开展银行、企业、农户、合作社等多主体合作模式,辅助小农户与现代市场有效衔接,拓宽农户群体增收渠道。另一方面,适度降低中西部地区、脱贫地区的村镇银行网点设立门槛,在银行业不发达的地区,推进村镇银行“多县一行”试点,借助移动终端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相结合等方式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推动金融深化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 陈秧分、刘彦随、龙花楼:《中国东部沿海县域农村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成因》,《经济地理》2009年第7期。
3. 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4. 崔恒瑜、王雪、马九杰:《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12期。
5. 董晓林、徐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金融研究》2012年第9期。
6. 胡金焱、张乐:《非正规金融与小额信贷:一个理论述评》,《金融研究》2004年第7期。
7. 胡宗义、李鹏:《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我国3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3年第2期。
8. 黄益平、王敏、傅秋子、张皓星:《以市场化、产业化和数字化策略重构中国的农村金融》,《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
9. 金文成、靳少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现实基础、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10. 李建伟:《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7年第10期。
11. 刘玉光、杨新铭、王博:《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12.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3. 陆智强:《基于机构观与功能观融合视角下的村镇银行制度分析——以辽宁省30家村镇银行的调查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
14. 吕勇斌、袁子寒、付宇:《村镇银行设立的攀比效应和竞争效应——基于空间probit模型的经验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20年第10期。
15. 罗宏、吴丹、郭一铭:《分行业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来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准自然实验》,《财贸经济》2024年第4期。
16. 马九杰、崔恒瑜、王雪、董翀:《设立村镇银行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产生“鲶鱼效应”?——基于农信机构贷款数据的检验》,《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9期。
17. 沈杰、马九杰:《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状况调查》,《经济纵横》2010年第6期。

- 18.孙永强:《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4期。
- 19.檀学文、胡拥军、伍振军、魏翔:《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形式发凡》,《改革》2016年第11期。
- 20.王雪、何广文:《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
- 21.王征、鲁钊阳:《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1年第7期。
- 22.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 23.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的证据》,《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 24.张博、孙涛:《稻麦人所食 南北竟谁分:金融组织区域发展差异的历史起源》,《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1期。
- 25.周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1949~2019年)》,《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4期。
- 26.周茂、陆毅、李雨浓:《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 27.Banerjee, A. V., &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1, No.2, 1993, pp.274-298.
- 28.Beck, T., Levine, R., &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5, No.5, 2010, pp.1637-1667.
- 29.Callaway, B., & Sant' 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ic*, Vol. 225, No. 2, 2021, pp. 200-230.
- 30.Cantoni, D., Chen, Y. Y., Yang, D. Y., Yuchtman, N., & Zhang, Y. J., Curriculum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5, No.2, 2017, pp. 338-392.
- 31.Chong, T. T. L., Lu, L., & Ongena, S.,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lleviate or Worsen Credit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37, No.9, 2013, pp. 3412-3424.
- 32.Clarke, G. R. G., Xu, L. C., & Zou, H.,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What Do the Data Tell U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72, No.3, 2006, pp. 578-596.
- 33.Hermes, N., Lensink, R., & Meesters, A., Outreach and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39, No.6, 2011, pp. 938-938.
- 34.Levine, R., & 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No.3, 1998, pp. 537-558.
- 35.Li, P., Lu, Y., &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23, 2016, pp. 18-37.
- 36.McKinnon, R.,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1973.
- 37.Morduch, J., The Microfinance Promis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7, No.4, 1999, pp. 1569-1614.
- 38.Petersen, M. A., & Rajan, R. G.,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0, No.2, 1995, pp. 407-443.
- 39.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re Small Banks Good: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Village Bank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YANG Che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50014)

ZHU Ji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100021)

MA Jiuji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Summary: There is an ongoing debate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come inequality.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empower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by improving their access to financial resources, potentially reducing income disparities.

Conversely, other studies contend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ten exacerbates inequality, predominantly favoring high-income individuals and perpetuating a “winner-takes-all” scenario.

Drawing from our theoretical model, we have developed an urban-rural two-sector model that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village banks within the financial allocation system on the income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village banks are prone to “mission drift”. This drift, if unchecked, may wide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which is central to our argument. Conversely, if village banks effectively execute thei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upport policies, they can help reduce income disparities and address uneven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at play, we identify that the weak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mong county banks contribute to this mission drift,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o support our analysis with empirical data, we compiled a balanced panel dataset encompassing 909 counties from 2010 to 2017 and us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village banks. Furthermore, to bolster the reliability of our conclusions, we have undertaken an array of robustness tests, placebo tests, and mechanism analys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village banks have not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Our bas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banks are linked to an average 2.12% increase in the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providing soli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Second,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weak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mong county banks are pivotal factors driving the mission drift of village banks, thereby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ird, the mission drift diverts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away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offer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we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management systems that enforce quantitative control and a bottom-ranking elimination mechanism for village banks to reduce their contribute to inequality. Second, it is essential to steer village banks back to their core mission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By incentiviz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y banks to support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e can stimulate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to grow continuously. Third, regulatory guid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sure that the agricultural-related business of village banks exceeds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county’s banking sector, while improving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mo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ing institutions. Fourth, in counties with a soli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or an underdeveloped banking sector, village banks and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should be moderately encouraged to establish grassroots branches, enabling them to effectively support agriculture and small businesses.

Keywords: Village Bank, Urban-Rural Income Gap, Mission Drift,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JEL: G21, R11, P25

责任编辑:诗 华